政大史粹第十期
2006年6月，頁153-176

從《台灣官紳年鑑》來看日治前期的基礎教育*

黃敦為**

摘　　要

日治時代的教育政策可以1922年新教育令的公佈作為分界點，分為兩個階段，其中前期所採的手段與政策較溫和，故對傳統漢學教育採取包容的態度，讓台灣人基本上具有選擇教育方式的權利。《台灣官紳年鑑》於1934年出版第四版，也是本文所使用的版本，因此從時間上推斷，裡頭多數的士紳都是在前期的教育環境下出生的。另一方面，年鑑所記載的人士由於都是社會上的精英，故對其受過教程與之後的發展都有詳細的記載，加上又有上千筆的可用紀錄，因此本文就將年鑑所記載的內容依台灣本島的行政區分為五

* 本文初稿完成於呂紹理老師之課堂上，感謝呂老師及兩位匿名評審的意見使本文能於修改後發表。惟因時間有限，故僅能作局部修改，望日後有機會再發表主題類似之文章以為本篇之補強。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C.E.P.S.

部份，再據其發展的不同，分為專業人士、工商人士與地方有力人士等三類，分別探討其教育背景。經由上述的統計與分析後，可以發現正規教育的普及程度受各地區在清領時間教育的影響，而分別在五個州呈現不同的比例。在正規教育裡，以各地公學校、師範學校(後改為國語學校)與總督府醫學校為大宗；傳統教育則以書房及家庭教育為主流。醫師、教師與地方上的望族比較有機會成為基層官員，反而是留美或留日的高知識分子往往從商居多，參與正統的政治活動機會較少。顯然「學而優則仕」這一觀念在日治時代並不可行，這也說明了何以日治前期在有所選擇的情況下，許多人仍然偏向漢學教育的原因。但具漢學教育背景者，其後代卻都轉向正規與留日教育，從這可看到隨著教育政策的緊縮讓漢學教育逐漸沒落的趨勢。

關鍵字：《台灣官紳年鑑》、日治前期、基礎教育

一、 前言

日治時期台灣現代教育，尤其是日語教育的推展，根據現有的許多相關論述指出，其實並非一帆風順。雖說在日治末期也就是 1943 年正式實施六年制的義務教育，最終也算是建立全民義務教育體制，[1] 但畢竟也已過了四十八年的時間了。在這段時間裡，特別是在 1922 年新教育令公佈，在形式上廢除日台分離的教育制度以前，究竟日本在這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其所實施的教育政策爲台灣培育了怎樣的人才？它又如何與台灣的傳統教育對抗或是共處？這時的台灣人對於新的教育制度與相關措施接受度又如何？關於這個議題，其實已有不少的討論，如周婉窈從日語運動的推展情形來討論日治時期的相關教育情形、[2] 吳文星則討論了日治時期台灣的師範教育與書房教育。[3] 本文試圖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待此一問題，主要參考昭和九年（西元一九三四年）林進發所編的《台灣官紳年鑑》。[4] 這本書所列之官紳，幾乎完全沒有在大正年後出生人士；[5] 而新教育令公佈時間是 1922 年，即大正 11 年，所以這些人至少在小學之前的教育環境都

---

[1] 薛化元，《台灣開發史》(台北：三民書局，2003)，頁145。

[2] 見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時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6:2(台北：新史學雜誌社，1995年6月)，頁113-161。

[3]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台灣師大，1983)；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3(台北：思與言雜誌社，1978年9月)，頁62-100。

[4] 林進發，《台灣官紳年鑑》(台北：成文，1999)。

[5] 必須強調的是，這本書裡有超過三成的人都未列其生辰月日，雖然如此，絕大多數的人從其經歷來看，應不至於是大正後出生的年輕人。

屬於本文標題所稱的日治前期。當然，符合本文條件的官紳傳在當時並非僅有《台灣官紳年鑑》一本，還有新高新報社於 1937 年編的《台灣紳士名鑑》、原幹洲於 1936 年編的《新台灣之人物》、台灣新民報社於 1940 年編的《台灣人士鑑》等。然而，一方面受限於人力與材料，再者這幾本書內容所載之人物亦有不少的重複。而《台灣官紳年鑑》一書所載人物也已有約一千五百人左右，就樣本數而言也已足夠，故本文就將焦點置於《台灣官紳年鑑》一書上。本文所採的分析手法爲量化的分析，即將《台灣官紳年鑑》中出生年代與生活情況符合本文預設條件之人的教育出身背景依地區與種類作統計，[6] 再根據統計結果與書內各人物的經歷來作討論與結論。

二、 日治前期的書房教育[7]

在分析官紳的教育背景前，我們先來看日治前期的各類基礎教育的發展，主要是書房教育與正規教育，兩者各自代表了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在日本統治台灣後，雖然府縣儒學、書院、義學等清代官學都遭到廢除，但民間的書房、私塾等幾乎在整個日治時代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一九二二

[6] 在這裡必須提到的是，在中北部的士紳多有記載其出生年代，但在南部的士紳往往未明言，故筆者乃根據其所附之相片與經歷來判斷其年齡。另外，有些人雖然出生日期符合，但若是在十六歲後才來台灣者，同樣不予以列入。

[7] 本段的書房教育內容，主要參考自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頁62-100，以及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思與言》26:1(台北：思與言雜誌社，1988年5月)，頁101-108。

C.E.P.S.

年書房併歸私立學校規則管理前，書房的教學內容儼然與正規學校形成對立，其中最主要的部份就是漢文的教學。雖然總督府一直使用各種手段在控管書房的教學內容，包括審核教學用書、強制規定日語教學、對符合其標準的書房予以更多的經費補助等，但畢竟書房教育的主要執行者仍然是傳統教育出身的教師，所以這些手段也就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除了教學者的因素之外，還有一些讓書房教育蓬勃發展的社會因素，茲整理如下：

(一)家長對公學校缺乏信心

由於日本是以異民族的角色進入台灣統治，加之早期又發生許多台人浴血抗日的事件，一般人也還停留在改朝換代和異族統治的傳統思想框架中，自然對於日語教育的接受度不那麼高，故在公學校未成立前，專以教導日語爲主的國語傳習所卻設立了漢文課程，可說是爲順應當時情勢而爲。[8] 至於早期的上層階級，主要都是受傳統教育出身，因而也將公學校視爲「番仔學校」，仍將漢文教育視爲正統；而公學校除了日語之外的教學科目，包括唱歌、體操、遊戲等，都與傳統教育的觀念格格不入，自然不會被這些仕紳所接受。

[8] 此觀點參考自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時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頁114-119。

C.E.P.S.

(二)傳統士人為謀出路，紛紛以開書房為生

根據吳文星的統計，[9] 在日本治台前十年，仍然有許多前清舉人、秀才、童生，甚至未得功名的傳統士人。這些人在新的政權下，可選擇的出路其實不多，教師這一職位是少數能讓他們發展其所學的地方之一。另一方面，在早期殖民政府爲籠絡地方有力人士，故對這些傳統士人不僅未打壓，有時甚至請他們至公學校教授漢文課程。[10] 既然傳統士人及其所開設的書房可爲當局者所接受，那一般人民在選擇時會傾向於書房也就不足爲奇了。

(三)漢文在日治初期仍為重要的溝通工具

由於統治初期整體局勢仍不穩定，加上日語的傳播不順利，故一般台人與台人間的交流，包括日常溝通、書牘、契約等，都以方言及漢文爲主，日文用到的機會並不多。而公學校雖然有漢文課程，但時數卻遠不如日語課程，且內容上也與傳統的漢學有所出入，因此以漢文教學爲主的書房當然成爲當時台灣人的首選。

綜合上述各樣因素，我們可以知道雖然在日治初期總督府頒布了「關於書房義塾規程」，另責成地方廳另訂「書房義塾施行細則」；然而，各

---

[9] 詳細的表格內容可見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頁86-87之表格五。

[10]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頁17-18。

個地方實施情況寬嚴不一，而且在前面所談到的各類背景下，可發現要實施嚴格管理有現實上的困難。故整體而言，書房教育在西元 1906 年兒玉總督離職前，它維持了十年左右的強勢地位。[11]

三、 日治前期的正規教育：公學校與師範教育、醫學教育

當 1895 年日本領台後，樺山總督即帶領當時的日本教育大家伊澤修二來台負責台灣教育問題。伊澤認爲當務之急就是要讓台人會講日語，乃於各地成立日語教學機構，也就是稍後的國語傳習所。至於傳習所內的教師人選，全由日本當地派遣而來，主要是由 1896 年後開設的國語學校師範部和語學部來負責師資的培育。而該年 4 月伊澤帶來的 36 名講習員，也是台灣在日治時期正規教育的最早一批教師。雖然總督府的教育政策受到現實財政狀況的影響而打了折扣，但到 1898 年兒玉總督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抵達時，至少國語傳習所與分教場已有一定規模。[12]

兒玉當局爲發展更永久的國民學校，也就是爾後的「公學校」，以使學生除了精通日語外，尚能習得更多的生活技能，同時加強孩童對日本的認同。[13] 於是在 1898 年 7 月，總督府發佈「台灣公學校令」，規定以地方經費設立六年制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並稱台灣的日語教育實屬義務

[11]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頁25-26。

[12] 以上關於國語傳習所的發展，參考自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頁11-15。

[13]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頁15-16。

教育之一，宜改以地方稅收辦理。[14] 但誠如上面所提到的，其內在的原因仍是總督府財力不足以負荷龐大的普通教育機制所致。如此一來，儘管後來又在公學校裡增設漢文課程，且又標榜其他課程的實用性，但公學校的部份經費卻讓地方上富裕的地主與商人負擔，漢文課程也與傳統中國教育有所出入，[15] 乃使公學校教育在初期與書房的競爭始終處於下風。

公學校令公佈同時，總督府同時也決定要發展其師資，乃又發佈「台灣公學校官制」，將教師分爲教諭及訓導，其中前者爲教學工作的主體，後者則扮演輔助教學的角色。畢竟台灣相對於日本而言是較偏遠的，故來台灣被一般日人視爲畏途，所以教師的招考若都以日本人爲主，往往會有不足額的困境發生；即便真的通過訓練來到台灣，也常常有水土不服與適應不良的情形出現。所以在後來的師範學校規則中，乃開放給台人報名進入師範學校就讀，條件爲十八至二五歲，精通漢文，畢業於官立學校、公學校或具有同等學力之台灣人。於 1899 年 4 月，總督府當局公告設台北、台中、台南三所師範學校，之後三地各都有募得約 50 名台籍學生，這也是台人接受師範教育的開始。[16]

然而，由於公學校的發展情形不佳，乃出現師範學校所培育的教師超過基礎教育需求的情形。總督府最終於 1904 年將三所師範學校全數廢除，師資培育的工作交由位在台北的國語學校師範部負責。其中分成甲、

---

[14]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上)，《台灣風物》37:1(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87)，頁6。

[15]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頁17-18。

[16]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台灣師大，1983)，頁17-18。

乙兩科，前者用以培育日籍師資之用，後者則以培育台籍教師與訓導爲目的。而隨著公學校與小學校的大量設立，師資的需求亦日漸提高，所以培訓內容與時間亦有變動，如 1913 年設農業教員臨時講習科、1915 及 1917 年各召開一次女教員臨時講習科等，這些大致都是根據實際的需要來加開的。[17] 不過至少在 1919 年前，整個基礎教育的師範體制就以國語學校師範部爲主，許多被列在《台灣官紳年鑑》的人士，若有教師經歷者，大體上都是出身前期的師範學校與後期的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

除了教師之外，日治時期另一個高社經地位的職業就是醫生，現就讓我們來看日治前期醫學教育的發展。醫學教育的起步較慢，到 1897 年才提供台人參與醫學養成教育，即在當時的台北病院設立醫學講習，也是台灣最早的近代醫學教育。到了 1899 年，總督府於台北設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至 1919 年爲止共招收 28 屆學生；之後改稱「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該一名稱維持到 1936 年，期間錄取了 15 屆。除此之外，日本赤十字社亦於 1902 年正式在台設立支部，1905 年支部醫院完工，其性質爲醫學校附屬醫院，提供上述醫學校學生實習之用。[18] 從《台灣官紳年鑑》所列之醫生出身來看，扣除在日本留學者外，其餘的九成以上都是經由這條管道成爲正式醫生，這批醫學校的畢業生和教師一樣都是社會中堅分子的一部份。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特別是前期的醫學教育和師範教育與現在台灣所實行者有一點很大的不同，即它們與基礎教育間並沒有

[17]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頁20-22。

[18] 以上關於醫學教育機制的沿革，參考自台灣醫療史料數位博物館，網址：http://203.65.117.106/project/direct/main5.htm。

明顯的上下銜接之關係。故在《台灣官紳年鑑》一書中，後來成爲醫生和老師者，有時候並沒有在公學校就讀過，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算是比較特別的一面。

四、 分析《台灣官紳年鑑》所列人物之教育出身

《台灣官紳年鑑》大約收錄了一千七百位當時台灣的著名人物，[19] 這些人的身份包括庄長、庄助役、協議會員、青年及壯丁團長、從事地方建設或商業的實業家與篤農家、醫生、信用組合負責人與理事等地方上知名人士；以及經營米穀、茶、土木、藥材等事業的工商人士，這兩類人占了全書半數以上。剩下的就是來台日本人，以及一些經歷較罕見者，如宗教家、辯護士、書記長、校長、[20] 地方法院判官、牧場場主……等，這些人每類在全書中都不超過五筆。所以在身份如此多類的情況下，本文乃根據每人不同的經歷與表現，將各人物概略地分成三類，即專業人士，主要是醫生，其他包括記者、音樂家、藝術家等都放入這一類；第二類是工商人士，即以經營商業聞名的人士；第三類是地方重要人士與基層官員，最

[19] 此為筆者概略的統計，之所以難以算出正確數字，是因這本書在編排上有些許的錯誤，如目錄上的頁碼與實際頁數不合、人物重複等。舉幾個目前筆者所查出之例子，台中州的朱阿貴在95與209頁重複出現、台中州的賴遠輝在163頁與209頁重複出現、高雄州的劉青江在79頁與94頁重複出現、高雄州的盧艇在83頁與93頁重複出現。應該還有其他錯誤，但因時間、人力因素，筆者無法一一查清，且錯誤並未明顯到影響本文之分析，故先予略過。

[20] 日治時期學校校長，特別是中學以上，幾乎都由日本人擔任，在本書中只有看到少數擔任公學校校長者。

主要的就是庄長、庄助役、協議會員、信用組合長等在地方上扮演重要角色者，同時，不屬於前兩類者也一併歸入此類，如教育家、資產家等。然而，並非每個人都只屬於一種類型，有不少人是從醫生或商人轉變爲地方上的重要人士，如果是前者，那一律將之列爲專業人士；若爲後者，則視其經歷而定，如活動以商業事務爲主體的，就列爲商工人士；如以地方事務爲主體，商業活動只佔其人生的一小部份，那就放入地方重要人士。

以上是根據《台灣官紳年鑑》所列人物之經歷與表現所作之簡單分類，但本文最重要的主題是在基礎教育，故在這些人的求學經歷上也同樣作了四項分類，分別是：書房及自學，凡是有提到精通漢學或國語，但完全沒提到在哪受教育，都放入此類。書房出身者自然也歸此。普通學校、師範學校與留學，只要經歷中有傳習所、普通教育、公學校、國語學校或師範學校畢業或者前往日本留學者，都放入此類。第三類則爲混合，有些人既學漢學，也到公學校或師範學校去受教育，由於很難斷定他受哪種教育影響較深，就將這些人歸爲該分類。至於完全沒有提到求學經歷者，[21]則放入「不明」類。但也有完全不屬於這四類者，即在明治十二年（西元 1879 年）前出生者，因日本治台時間從明治二十八年（西元 1895 年）開始，而這些人已遠超過基礎教育的受教年齡，故不予列入。接下來就依照前述的身份與教育過程分類，再劃分爲五個主要的地區，分別是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與高雄州分別製表與分析，雖然《台灣官紳年鑑》

[21] 並不是說沒有寫求學經歷就一定是未受教者，有些可能也是當時的記錄疏漏。如台南州131頁的林文欽，經歷中寫他是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卻未寫其求學過程，但像這樣的人不太可能完全未接受教育，應是漏記所致。

也有放入台東州與離島地區的官紳，但由於樣本過少，本文就不將它們列入討論。

(一)台北州

首先來看台北州的統計情況，表列如下：

	書房與自學	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與留學	混合	不明	總計
專業人士	2	31	1	1	35
工商人士	26	37	18	28	109
地方重要人士與基層官員	32	70	28	31	161

以上總計採樣 305 人。其中專業人士八成以上是醫生，其他則是畫家、書法家、新聞記者、詩人等，書房與自學以及混合與不明這兩類大都出自這些人。工商人士以經營茶行與米穀以及在工商界活躍之實業家爲大宗，其他則有經營鐵工場、服裝、古玩、自動車……等商人。地方重要人士以庄長、助役、協議會會員、信用組合理事等主要，其他則是青年與壯丁團長、名望家、地方有力者……等。整體來說，台北州畢竟是最接近總督府的區域，所以不少人都受過正規教育，尤其從地方重要人士這一欄可發現，想在台北州出頭，除非擁有強大的地方影響力，否則都必須設法學會一些基本日文。因此，從書中可以發現在明治四十年後出生的人絕大多數都接受過公學校甚至中學教育，故正規教育的發展在這一區算是順利的。

(二)新竹州

再來看新竹州的統計情況，表列如下：

	書房與自學	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與留學	混合	不明	總計
專業人士	0	22	0	0	22
工商人士	2	7	0	1	10
地方重要人士與基層官員	23	75	50	36	184

以上共採計 216 人。其中專業人士以及地方重要人士與基層官員這一類，大致上都與台北州的情況都相同。至於工商人士在這該區裡明顯少了許多，是否是商業較不發達，導至另外兩類人士較受到重視，這尚需其他資料佐證才能得知。但除了這個差異外，整體而言北部地區的這兩個州其比例大致上差異不大，同樣是以正規教育出身者占很大優勢。

(三)台中州

接著再來看台中州的統計情形，表列如下：

	書房與自學	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與留學	混合	不明	總計
專業人士	0	64	1	1	66
工商人士	27	27	6	28	88
地方重要人士與基層官員	72	131	26	70	299

以上共採計 453 人。到了台中州專業人士幾乎全是醫生，學歷不明的醫生有多一些，但整體而言仍是醫學專門學校與留日者居多。至於工商人士部份雖然比不上台北州，但遠較新竹州爲多，可見台中地區的商業在當時也算發達；從工商人士受教育情況來看，台中州正規教育出身者已有少於台北州之傾向。到了地方重要人士與基層官員這一層，其受教情況依然

保有這樣的傾向。但整體而言，正規教育出身者仍然略多於傳統教育加上完全未接受教育者的人數。

(四)台南州

接下來看台南州的情況，表列如下：

	書房與自學	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與留學	混合	不明	總計
專業人士	0	40	1	4	45
工商人士	8	17	3	6	34
地方重要人士與基層官員	65	46	10	82	203

以上共採計 282 人。在專業人士部份，可以發現占全部士紳的比例變多了，這些人全都是醫生；而工商人士的數量則較台北、台中兩州少了許多，可見在工商較不發達之地區醫生在地方上的地位就相形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重要人士與基層官員的受教情況，即便將混合情況也算入正規教育的一部份，但受傳統教育者仍占有優勢，這樣的情勢明顯與前面所提到的三州有很大差異。

(五)高雄州

最後來看高雄州的情況，表列如下：

	書房與自學	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與留學	混合	不明	總計
專業人士	0	34	1	1	36
工商人士	16	12	8	12	48
地方重要人士與基層官員	28	48	11	45	132

以上共採計 216 人。在專業人士部份，台南州與高雄州相近，成員

都是醫生，也占有和工商人士相距不遠的分量，同樣有些教育出身不明的醫生。[22] 但正規教育在這一區卻再度蓋過了傳統教育，可見並不是離政治中心越遠普通教育的勢力就越弱。所以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本文就針對這五州的統治結果作分析與結論。

五、 從台灣官紳的教育出身討論日治前期的台灣教育

綜合以上對日治時期各類基礎教育的論述及台灣官紳的教育出身統計，再輔以台灣官紳的相關經歷，本文試圖作以下幾點延伸討論：

(一)日治前的教育文化對日治初期教育推展的影響

從上面五個州的士紳之受教情形來看，即便離政治中心最遠的高雄州，正規教育仍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在台南州，卻又發生傳統教育勢力大於高雄州的情形，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呢？這可能必須從台灣在清代的發展談起。早在明鄭時期，台灣發展的重心是以台南地區爲主，到了清領時期隨著時勢的轉移，重心則移至台中地區；到了 1860 年開港後，則逐漸轉移到台北地區。現存對 1895 年前台灣教育研究的相關文章，也是以此三區的探討爲最多，關於高雄的部份就少了許多。[23] 所以如果就只談論

---

[22] 如台南州32頁之蔡超、59頁之何纘緒、85頁之戴春成、91頁之邱魏瑞、125頁之黃文陶；高雄州18頁之許祖勳等皆是。在其他三州並無這樣的情形，醫生一定有明確的學歷。

[23] 筆者找到三篇專門探討地方教育的文章來作比較，分別是單文經，〈一八九五年以前鹿港教育史初探〉，《教育研究集刊》40(台北：師大書苑，1998年1

漢學教育來講，台北州、台中州與台南州三地應是最發達者，新竹州與高雄州就相對薄弱。因此，在日本統有台灣後，傳統教育基礎較薄弱的地區反而對日本所施行的正規教育接受度較高。至於台北與台中兩州由於發展性較佳，故日本當局必然會投入更多的資源來發展普通教育，所以傳統教育的勢力就難以與其抗衡，但仍保有一定的力量，特別是台中州。而台南州就殖民政府而言，其重視程度相對不如台北與台中兩州，故傳統教育得以獲得較充裕的發展空間，也間接阻礙了正規教育的推廣。

(二)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的推展與在台統治日人人數之關聯

《台灣官紳年鑑》除了列出著名的台灣人外，亦有來台擔任官員之日人記載，上至總督，下至協議員都有記載。關於日本人與台灣人的人數及其比例，表列如下：

	日本人人數	台灣人人數	日人／台人百分比
台北州	114	372	30.65%
新竹州	29	253	11.46%
台中州	38	495	7.68%
台南州	40	326	12.27%
高雄州	26	220	11.82%

月)，頁17-49；單文經，〈日據時代鹿港地區的教育活動〉，《教育研究集刊》42(台北：師大書苑，1999年1月)，頁113-142；黃文樹，〈高雄市初等教育發展史簡論〉，《高市文獻》13:4(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0年10月)，頁1-29。對於鹿港地區在清代的教育可以一篇專文來作討論；但來到高雄時，卻因文獻不足而無法作深入的描述，故只能簡單地一個段落帶過，其他的篇幅都是1895年後的高雄地區初等教育。

從這個統計中，可以發現台北地區的日人人數與比例都是五區裡頭最高的。若再配上之前的教育出身統計，筆者嘗試作出以下的解釋。由於在台北地區常常需要與日人溝通，有較多的日本統治者也意味著政策的執行較爲嚴密，故爲迎合當局的要求，這些地方人士只好設法加強自身的日語能力，也間接促進普通教育的發展。另一方面，較多的日本人，也爲想學日文的台人提供了較佳的學習環境，畢竟語言的學習是需要環境的配合才能達到最佳效果。

(三)小學校教育對台灣的影響

在日治前期，在台日人的子女其接受基礎教育之場所與台人的公學校不同，一般稱之爲小學校。小學校的教師一定是日籍教師，待遇甚至比在日本的日籍教師高，且小學校的設備也比公學校佳，並設分部以服務在邊區不易就學的日人子弟。[24] 至於台人有機會進入小學校，則是到 1920 年以後的事了。那小學校在日治前期照理說應培育了不少日本人，這些人後來的發展如何？對台灣又有何影響？筆者仔細觀察《台灣官紳年鑑》中所有日本人的學經歷，發現所有人都是從日本受完正規教育後來台，完全沒有從小學校畢業者。究竟在台受教育的日本人成長後都回日本發展，還是留在台灣並沒被載入，這尚須更多的研究才能得知。[25] 總之，從《台灣

[24] 關於小學校的簡介，詳見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頁60-61。

[25] 關於在台日人受教育的期望與心理狀況，可見藤井康子，〈從問卷調查來看在台日本人中學生的生活實態——以一九二、三〇年代的情況為中心〉，《台

官紳年鑑》的人物出身看不到台灣小學校的相關記錄。

(四)升遷機會與普及正規教育之關聯

在《台灣官紳年鑑》中，可以發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重要職位都由日本人擔任，而台灣人最高就是當庄長、總督府評議員、地方協議員、信用合作理事等職，但這些人未必就擁有高學歷，甚至有些人還不通日文；相反地，許多擁有高學歷的人反而未朝政界發展，[26] 對於具有「學而優則仕」這一觀念的台灣人來說，難免會有不適應或無法接受的情形。此外，從事商業者也有機會可以當上基層官員，而對商人來說學歷並不是那麼重要。所以在日本政府不願開放太多的參政機會給台灣人的情況下，讓許多法商專門人才無法參與政事，反而是教師與醫師具有相對來說比較好的參政機會，這可能也是正規教育難以普及的社會因素。

(五)書房教育在日治前期的教育成效

關於這點在《台灣官紳年鑑》中其實不容易深入探討。可能是由於總

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8(台北：台灣教育史研究會，2000年3月)，頁2-20。

[26] 如台北州186頁的王德祿，畢業於明治大學法學部，回台後僅在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掌理事務；台北州190頁的李昆玉擁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士學位，但身份是李仲義商行主；新竹州98頁的范姜新鰲為九州帝國大學法學科畢業，後來在自動車公司上班；新竹州105頁的周宜培從東京中央大學法學科畢業，之後跟隨其父親服務地方；台中州163頁的賴遠輝獲得東京中央大學法學科法學士的頭銜，之後擔任日華新報台灣總支長。

督府對書房教育一直都採取反對的態度，所以在記載這些人的求學經歷時也就不特別寫明這些官紳在哪些書房求學過，故“書房”二字在這本書中很少出現。[27] 而且越往南部，書房出現次數不僅未提升反而變少，大多數都只寫“精通漢學”、“漢文造詣深”等字樣，即便在台南州依然如此。推測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編輯者的忽略外，可能在前清時代北部地區的教育就比較發達，所以到了日治時期書房教育自然就偏重在北台灣，南台灣不論在書房教育或正規教育都較北台灣落後，南台灣的漢文教育可能都是家族內部傳授學習居多，但關於這點可能必須再找尋更多的相關資料方能確認。

六、 結論

一項教育政策的成功與否，往往得觀察數十年的國家社會的發展後才能較清楚地檢視其優缺點。在日治前期統治尚未非常深入與穩定的情形下，總督府不得不與傳統教育作妥協，並根據台灣的情況另外設計適合的公學校課程，同時容許書房這個非正規的教育管道存在。此外，正規教育的發展在各個行政區都有些微的差異，所以有些地區可以很快地接受，有些則不然。然而，如果只就全台灣而論，從《台灣官紳年鑑》中可發現仍

[27] 《台灣官紳年鑑》有書房名字出現者，有台北州114頁之周庭生於大湖書房、台北州119頁之呂振昌於大潮書房、新竹州76頁之徐元標於青雲書房、新竹州87頁之楊成泉於龍潭坡上達書房等。至於中南部都僅以書房帶過，且出現次數極少，據筆者觀察只有高雄州90頁的施福義，曾就讀於陳中書房，是唯一有出現書房及其名稱者。

C.E.P.S.

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台灣官紳受過日治時代的正規教育，最大的成果就是爲台灣培育了許多西醫與基層教師，而這些人也在後來成爲台灣社會的中堅。[28] 但在明治與大正，甚至是昭和前十年，具有傳統教育背景與懂漢學的人仍在地方上占有一定份量，特別是台中與台南兩州尤其如此，這也正是日治前期妥協政策下所造成的現象。然而，有些傳統教育出身的人士，其子女卻都接受正規教育，[29] 可見隨著時間的演進，台灣人對於接受日本教育已不再那麼排斥。這樣的趨勢如果再發展二十年以上，相信必然會使受日本教育的人士成爲社會主幹，可惜的是日本的統治並沒有維持這麼長的時間，所以也無從證實這一推論。總而言之，雖然《台灣官紳年鑑》是官方編輯的書籍，根據這本書所作出來的研究多少有偏向殖民政府與上層社會的意味，但至少從這本書可以看到早期日治台灣教育的另一面，也提供了我們其他值得深入研究與思考的課題。

(本文於 2006.4.11 收稿，2006.5.12 通過刊登)

---

[28] 醫師和教師成為地方上的知名人士在中、南部地區比較明顯，在北台灣特別是台北州，比例上就少了許多，可能與北台灣工商發達，社會分工較細，近代化程度較高有關。

[29] 如台中州215頁的許天象，長子讀早稻田、次子讀台中一中、三子讀談水中學；台中州220頁的張曉峰，長子與次子擔任公學校教師、三男畢業於台中一中、四男就讀於東京齒科；台南州頁71的廖香，兒子讀台北醫專、女兒入高等女學校；高雄州的劉朝聘，長子就讀於東京中央大學。

徵引書目

(一)專書

1.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台灣師大，1983。
2. 林進發，《台灣官紳年鑑》，台北：成文，1999。
3. 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
4. 薛化元，《台灣開發史》，台北：三民書局，2003。

(二)期刊論文

1. 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3(台北：思與言雜誌社，1978年9月)，頁62-100。
2. 吳文星，〈日據時代台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思與言》26:1(台北：思與言雜誌社，1988年5月)，頁101-108。
3.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上)、(下)，《台灣風物》37:1(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87)，頁1-30；37:4(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87)，頁52-86。
4. 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時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6:2(台北：新史學雜誌社，1995年6月)，頁113-161。
5. 單文經，〈一八九五年以前鹿港教育史初探〉，《教育研究集刊》40(台北：師大書苑，1998年1月)，頁17-49。
6. 單文經，〈日據時代鹿港地區的教育活動〉，《教育研究集刊》42(台北：師大書苑，1999年1月)，頁113-142。

C.E.P.S.

7. 黃文樹，〈高雄市初等教育發展史簡論〉，《高市文獻》13:4(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0年10月)，頁1-29。
8. 藤井康子，〈從問卷調查來看在台日本人中學生的生活實態——以一九二、三〇年代的情況爲中心〉，《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8(台北：台灣教育史研究會，2000年3月)，頁2-20。

(三) 網站

1. 台灣醫療史料數位博物館，http://203.65.117.106/project/direct/main5.htm。

C.E.P.S.

A Study of the Basic Education of the Early Stage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from *Almanac of Bureaucrat and Capitalist in Taiwan*

Tun-Wei Huang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educational policy in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by the New Educational Policy in 1922. The policy in the former period was more moderate than the latter, so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s allowed to co-exist. *Almanac of Bureaucrat and Capitalist in Taiwan* published the forth edition in 1934, which is used as an object of this study. We may infer from its background that the people depicted in *Almanac of Bureaucrat and Capitalist in Taiwan* grew up in the early stage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addition, people depicted in *Almanac* are belonging to upper class at that time, so their educational and work experience was recorded in detail.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thousand useful records in *Almanac*. The researcher will sort the date by administrative areas into five parts, and then divide these parts into three categories: professional personalities,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personalities, and local personalities, with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alyze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read of standard education was affected by the educational condition of the Ching

Dynasty. The standard education, it was mainly composed of local elementary school, normal school (later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and medical school; traditional education was composed of private school (shu-fang) and family education. Doctors, teachers and local prominent people would have a good chance to join in local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most of the intellectuals who studied in Japan or America went into business upon returning to Taiwan, and only few intellectuals became local officials. Their outstanding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as not necessarily guaranteed to the career in bureaucracy, which was opposite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notion. This is why the Taiwanese preferr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However,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most of their children received standard education in Taiwan or Japan. Thus, traditional education was on the decline,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Keywords: ***Almanac of Bureaucrat and Capitalist in Taiwan,*** **early stage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basic education**